

美国“改革年代”的外来移民*

伍 斌

摘要：《改革年代》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最重要的著作。该书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文化做了总体性研究，其中涉及的诸多内容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的经典议题，激励历代历史学者对之进行再阐释。这一时期，美国也接收了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大规模外来移民。这些移民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限于研究主题和当时学术语境，《改革年代》中涉及移民与美国政治文化互动的文字不多。在这些只言片语中，霍夫施塔特涉及当时美国移民的三个核心问题：政治参与、美国化和移民限制。霍氏的极简论述既不能充分反映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冲击，也无法深入窥视美国社会对移民所施加的影响。事实上，移民与美国“改革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桴鼓相应，在国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两方面都具有转折性意义。

关键词：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改革年代》 移民 美国化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英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社会思潮更迭与移民史学范式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24ASS003)的阶段性成果。

年早逝，却留下数部美国史经典著作，其中《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文简称“《改革年代》”）^①一书被认为是他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是对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治文化的整体性研究。霍氏将其研究的改革运动分为三个时段，其中前两段为19世纪90年代到1914年，而他最初设想的，也是集中撰写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在成书的最后一章“新政”中，其论述的深度和细致程度明显不如此前诸章。霍氏着力论述的时段，恰是美国移民的高峰期。美国历史学家对这一主要来自东部和南部欧洲的移民浪潮给予了很大关注，重点分析这些移民对美国的经济贡献及其在美国所遭受的排斥；对特定移民的个案研究，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②而霍氏所提及的移民在美国政治中的参与问题，仍是美国学术界尚未清晰解决的课题。这些移民在美国“改革年代”中扮演了什么角色？霍夫施塔特是否意识到了移民的这些角色？霍氏对移民的描述与美国历史上移民的实际经历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落差？

一、移民对“改革年代”美国政治的有限冲击

1890至1914年间，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外来移民高峰期，入境人数近两千万之众，其中逾八成成为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同此前美国以西欧和北欧人为主的移民相比，东欧和南欧人在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理念，乃至肤色上都有较大差异。虽然美国长期以来“已习惯大量移民的涌入，然而对于移民来源地的巨大转变，本土扬基人尚未做好准备；这一转变在1900年以后显得尤为明显，移民从以前较为熟悉的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斯堪的纳

①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王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

② See Thomas Kessner, *The Golden Door: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 Mobility in New York City: 1880–19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Donna R. Gabaccia, *From Sicily to Elizabeth Street: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Italian Immigrants, 1880–1930*, New York: States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4; Daneil Soyer, *Jewish Immigrant Associations and American Identity in New York, 1880–193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Jeffrey S. Gurock (ed.),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Volume III: East European Jews in America, 1880–1920: Im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three parts)*,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Hasia R. Diner, *Hungering for America: Italian, Irish, and Jewish Foodways in the Age of Mi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ristopher M. Sterba, *Good Americans: Italian and Jewish Immigrant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aria Serra, *The Imagined Immigrant: Images of Italian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890 and 1924*, 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维亚人和德国人，变成了南欧和东欧来的农民——包括大量波兰人、意大利人、俄国人、东欧犹太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①与最初试图在美国捞金后返回母国的移民不同，越来越多东南欧移民选择在美国定居，并获得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资格。

在美国历史上，白人男性移民相对容易归化入籍，一般不会因其宗教信仰或非本土出生而遭到排斥，甚至在担任公职等方面都不会存在太大阻碍，除宪法要求美国总统必须由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担任之外。^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有不少东南欧移民具备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的资格，但他们对入籍申请并不积极，对美国政治的直接参与不多。美国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1904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演讲中也意识到，“移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多的是工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③不过，这些移民给美国政治带来的间接震荡和冲击则具有划时代意义。将这一时期称为美国移民历史的转折时代亦不为过。

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注意到这场移民大潮对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产生的影响，在移民和土生美国人的相互碰撞之下，“产生了两种有着根本差异的政治伦理体系”，第一种是“建立在扬基-新教的本土政治传统，以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基础之上，主张并要求公民持续地、无私心地参与公共事务”的体系。“另一套体系则以移民的欧洲背景为基础……认为个人的政治生活理所应当是发生于家庭的需求，基本上将政治和公共关系解释为一组私人义务，认为比起忠于抽象的法律或道德规则，稳固的私人效忠关系更为重要。”霍氏认为，“移民、大佬和城市机器的政治生活，便主要建立在这套价值体系之上”。两种体系的对立导致了美国“新教社会改革领导者”和“大佬、职业政客和移民大众”间的冲突。^④

在霍夫施塔特看来，移民在美国城市机器和政治方面影响较大。如果从美国当时一些移民较为集中的城市如纽约、芝加哥来看，这一论述无疑有其道

①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3页。

② Hasia Diner, “The Encounter between Jews and America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Th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Vol. 11, No. 1 (Jan., 2012), p.22.

③ Jane Addams, “Pen and Book as Test of Character,” *Survey*, Vol. 29 (Jan., 1913), p.420.

④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8页。

理。“大佬看到了移民的需求，并将其变成了城市机器的一个政治部件。机器能够让移民迅速入籍，为他们提供工作和社会服务，为他们接触政府机构提供私人渠道的方便，让他们从司法部门的监视下解脱出来，并尊重他们的族群自尊心。作为回报，它获得了票仓，将这些新来的公民引往投票点，移民们出于对享受到的服务心存感激，也便欣然服从城市大佬这种老谋深算的领导。”^①

在“改革年代”美国的外来移民中，确有少部分被动卷入美国政治，而掌权的政治机器利用移民维持权力。开冰激凌店的意大利人如果不给相应的政治机器投票，就很有可能无法保证其食品营业执照；波兰酒馆老板如不能让其同胞投票支持当地的城市老板，就会失去卖酒资格。^②霍夫施塔特认为，这些移民不但使美国陷入畸形扩张，“并常常为了换取保护和好处而出卖选票，从而令大佬对城市政治的掌控得以进一步强化”；“移民在政治中追求的并非崇高原则的实现，而是一些具体的、属于个人的收获，并且是通过私人关系来得到这些收获”。^③移民创办的母语报纸是引导移民参与政治的另一种重要手段。这些报纸虽对移民读者的影响不小，却常常入不敷出，陷入财政困境。其中不少报纸为获得经济支持而倒向相应的政治党派，成了特权者获得并固化其权力的工具。^④

正是基于部分移民在选举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和公共意识，这一时期的社会改革家们甚为担忧，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移民参政的措施。霍夫施塔特指出，美国的中立派“对于毫无限制的移民涌入可能导致的长期后果，他们一直忧心忡忡，由于害怕族群同质性的下降将在未来对传统民主造成破坏，他们甚至开始对普选权提出质疑”。^⑤许多进步改革家支持加强选民登记，以期减少政治腐败。^⑥爱德华·罗斯认为，如果移民既没有堕落，也没有被误

①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3—204页。

②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Im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20, p.322.

③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7、210页。

④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Im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p.323.

⑤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5页。

⑥ Walter Dean Burnham,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Univer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pp.7-28;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1970, pp.71-90.

导，而是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美国社会的一股积极力量，反之则会带来消极影响。^①霍夫施塔特也指出：“移民往往来自农民的环境，来自一些存在着大量封建残余的专制社会，完全无法适应一种积极的公民角色。”^②不过，霍氏的这种论述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对于初到美国的移民而言，确实存在这一问题；而对那些在美国居住有年的移民来说，他们难以适应霍夫施塔特所说的“积极的公民角色”，主要并非因为其“封建残余”，而是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有限，移民总体缺乏受尊重的自然同化途径。

整体而言，“改革年代”的移民在美国政治上的直接影响力有限。这些东欧和南欧移民虽不难获得美国地方，甚至联邦层面的选举权，但他们总体对直接参与政治并不感兴趣。这既与母国社会的传统有关，更因他们在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正如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所言，这些移民多挣扎于生存的边缘，既无闲暇也没有健康保障，不具备“美国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受过教育，且“一定是自由的”；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受制于他人，那他就不是自由的。^③而初到美国的东南欧移民，多在经济上极为脆弱，很容易形成经济依赖。这也导致移民参与美国政治并不积极。除个别地区，被选者对移民选民也不是特别重视。国会议员的选举只有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才会对移民选区做出反应。^④

美国政治学家沃尔特·伯纳姆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移民选民的政治参与率总体上是下降的。^⑤如果伯纳姆是正确的，那么进步主义非但没有引发大规模民主浪潮，反而伴随着一种选举制度日益由中产阶级

①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Im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pp.323-324.

②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9页。

③ Louis D. Brandeis, "True Americanism,"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 pp.640-642.

④ Allen F. Davis, "The Social Workers and the Progressive Party, 1912-1916,"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9, No. 3 (Apr., 1964), p.680.

⑤ Walter Dean Burnham, "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Universe," pp.7-28; Walter Dean Burnham,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pp.71-90.

主导的趋势。美国加强选民登记要求的运动，也无意或有意地剥夺了大量移民的选举权，阻碍了该群体参与政治。这表明，“改革年代”的政治改革者总体上与城市移民的联系是微弱的。

另有诸多证据表明，进步人士对城市移民持有的怀疑甚至敌意态度，也影响到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参与。例如，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海斯在对得梅因（Des Moines）和匹兹堡的改革运动的研究中发现，这些城市的进步改革者主要是社会的“上层阶级”，其中大部分是商人和专业人士。尽管他们使用改革者常用的民主修辞，但在许多改革活动中，他们主要关注的似乎是重组市政府，以减少中心城市工人阶级和移民的政治权力。^①爱德华·罗斯也指出，如果对美国公民权利和义务一无所知的移民获得公民身份，那么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垄断、劳工保护等问题都将持续出现，公共利益也会因之受损。^②路易斯·布兰代斯认为，每个公民都必须接受广泛而持续的教育，教育必须贯穿一生，如果仅是接受学校教育，则无法实现有效的政治参与。^③其言下之意是，连学校教育都没有系统经历过的移民，更没有参与美国政治的资格。

积极卷入美国政治的移民亦不乏其人，其中以劳工移民居多。移民工人渴望广泛的社会改革，为了“伟大的事业”团结各移民群体和改革团体，甚至谈及成立一个新政党的必要性。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退出共和党，成立新的进步党。移民和其他改革者一起，在推动这一新政党支持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支持进步党，不是因为罗斯福，也不是因为新民族主义理论，而是因为他们帮助起草的进步党纲领中的社会和工业改革的条款。^④

相对而言，已经很大程度上实现美国化的德国和爱尔兰移民，在美国政治中的参与度更高。他们不但积极参加美国各级政府的选举，也在一些地方政府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1912年，芝加哥市政府的18位主要人物中，有

① Samuel P. Hays,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Vol. 55, No. 4 (Oct., 1964), pp.157-169.

②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Im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323-324.

③ Louis D. Brandeis, "True Americanism,"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641.

④ George E. Mowr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46, pp.220-255; John M. Blum, *The Republican: Roosevel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49.

14位是爱尔兰人,3位是德国人;波士顿市政府的11名主要官员中,有9人是爱尔兰人,市下议院的49名议员中,有40人是爱尔兰人的后裔。^①即便是这些已经“美国化”的欧洲移民担任行政职务,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不小冲击。土生美国人担心人数规模更大,文化差异更显著,没有实现“美国化”的东欧和南欧移民如果积极参与美国政治,会给美国体制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要尽力避免没有美国化的移民获得归化资格。于是美国在1906年成立了移民归化局,增加移民入籍的申请费用及对英语的要求,加强了联邦当局作为美国公民身份看门人的角色,对特定移民群体进行限制。^②这些措施都增加了移民归化入籍的难度。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提交入籍申请意愿书的移民是最终成功归化者的三到四倍。在1907年至1908年,全美归化入籍移民约26 00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888年至1892年,仅在纽约的一个法院就有多达15 000名移民入籍美国。^③

不难看出,自美国建国以来,移民入籍一直是美国宪法和移民史的重要方面之一。从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的总体背景来看,美国的归化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试图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并使之成为美国公民。但联邦政府还必须通过入籍法来解决美国民族意识的核心困境:一方面体现移民入籍美国是容易的,这是美国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不同移民群体的大规模入籍也引发美国社会对新公民的素质和美国特性可持续性的担忧。^④因此,美国社会为防止移民过多参与政治,而以“创造更好公民”的名义来控制 and 减缓移民入籍的进程。

不过,犹太人在这波东南欧移民潮中的经历颇有些“例外”的意味。在“改革年代”,虽然犹太人也遭受美国社会的诸多歧视和排斥,但美国政治总体对犹太人较为开放。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长期博弈,为犹太人参与美国地方

①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 of Im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319.

②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Naturalization, *Historical Sketch of Natur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6, p.16.

③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p.32.

④ Dorothee Schneider, “Naturalization and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in Two Periods of Mass Migration: 1894–1930, 1965–2000,”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 21, No. 1 (Fall 2001), p.50.

政治开启了一扇窗户。犹太男性经常在地方选举中设法让自己成为候选人并赢得公职。例如，在1900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选举中，两党都派出了犹太候选人。到1910年，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Stamford）的选民选举一名犹太人进入州议会，另有两名犹太人担任治安法官。在整个改革年代，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①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犹太人担任美国联邦政府的职务。第一位犹太人内阁成员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于1906年担任商务部长，路易斯·布兰代斯于1916年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②犹太人能够进入美国各级政府的公职，反映出内战后美国两党政治的基本稳定。两党需要在不同选区进行争夺，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群体。犹太人从这种情况中受益。与西方许多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主要政党或政治运动并未将犹太人定义为“问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移民呼吁改革的原因不是获得公民身份的不平等，而是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提及的政治机器使移民投票工具化及围绕它的腐败。这才是改革的重点。有关移民入籍的辩论，一直伴随着新入籍的公民是否能履行好美国公民义务的担忧。19世纪90年代至1907年，联邦政府对移民入籍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的入籍与美国化并无直接关联。这就形成了移民在入籍与美国化之间的张力。入籍则意味着拥有公民身份和权利，但只是美国化的内容之一。美国社会推行“美国化运动”，其目的并不在推动移民入籍，而是希望移民能彻底抛却过往，认同美国的文化和制度，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之中，甚至不惜将“美国化运动”推向极端，导致了在美国流行一时，且给移民情感带来严重创伤的“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

二、对移民的“美国化”举措

每一波大规模移民潮都伴随美国社会对移民同化的焦虑。从19世纪40年

① Hasia Diner, *The Jews of the United States, 1654-20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158-160.

② Hasia Diner, “The Encounter between Jews and America in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p.23.

代出现大规模爱尔兰移民开始，美国社会的这种担忧变得突出。1855年，当时风靡一时的排外政党“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选出了六位州长和一些国会议员。该党的核心理念是“美国主义”，并煽动美国社会对移民“非美国性”的恐惧。“一无所知党”担心的正是移民的“美国化”问题。这也是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提及的一个重要问题。霍氏指出：“工业化的兴起带来了当时人眼中的‘移民入侵’，一场持续了四十年大规模欧洲移民潮。这些移民主要是农民，其宗教、传统、语言的复杂度，甚至仅仅就人口数量而论，都决定了同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霍氏也提到“美国化”教育，指出“温和保守派与持自由主义思想的进步派一样，都加入了对移民实施归化的事业，办法是让他们学习英语，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公民指导”。同时，霍氏还提到土生美国人在“美国化”移民进程中的复杂情感：“在移民问题上，进步派常常怀有和平民党人一样的偏见，也像平民党人那样畏惧族群的混合，可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情感加以克制，感到对移民负有一种责任，同时也认识到移民的归化是一个必须通过人性化和具有建设性的方案来加以应对的实际问题。”^①对移民在“美国化”中的情感纠结与现实困境，霍夫施塔特亦有关关注。他指出：“移民无法按一种理想化的速度完成归化，即剪断他的欧洲身份意识。夜校及英语课的实际好处，他固然是愿意享受到的，他也愿意尽其所能地接受一种新国籍，并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可是，哪怕并没有感受到敌意，他却很难不去注意到那些试图帮助他的人们所表现出的那种以恩人自居的意味。”^②在当时的美国历史语境下，“同化”事实上等同于“美国化”。霍夫施塔特所论虽涉及当时移民“美国化”的一些重要问题，但移民具体的“美国化”历程要复杂得多。

什么是“美国化”？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改革年代”的很多政治和文化精英对“美国化”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美国教育家艾萨克·伯克森在研究中指出，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和文化为基础的美国化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所有来自外国的新移民必须迅速摆脱他们的旧特征……消

①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7—8、153、207—208页。

②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8页。

除一切种族差别，彻底忘记他们的出生地，一心一意地坚持美国生活方式，从记忆中完全抹去对其传统的所有回忆”。^①伍德罗·威尔逊认为给美国化下定义并非难事。他在1915年5月10日的费城演说中提及，一个移民除非在各方面“成为彻底的美国人”，否则“就不能把自己奉献给美国”；在美国，“一个认为自己属于某一特定族群的人还没有成为美国人”。^②路易斯·布兰代斯也指出，着装、礼仪习俗，甚至语言都只是美国化的表象，移民“要实现美国化，变革必须是根本性的”，其对美国的兴趣和感情要根深蒂固，必须与美国人的理想和愿望完全一致，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否则就不算美国化。^③美国社会改革家弗朗西斯·凯勒也指出，移民实现美国化的首要原则是将美国视为真正热爱的家园，首要任务是践行美国人的观念，其方式则是理解美国的理想，并在日常生活中诠释这些理想。^④

在这些政治文化精英中，西奥多·罗斯福对移民的美国化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释。^⑤他强调，美国人同欧洲人虽然在血缘与文化上有紧密联系，但美国人是“一个新的、独特的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如果移民没有实现美国化，则会对自由的美国政府造成威胁。他认为，在美国，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不是美国化的美国人，“没有一个带连字符的美国人是好美国人”；如果移民没有实现美国化，很容易导致美国“走向毁灭”，要避免这种情况，则必须保持美国的同质性。罗斯福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确保移民作为美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求他们履行作为美国公民的义务，“如果一个移民不适合成为美国公民，他就不应该被允许来美国”。因此，在罗斯福看来，美国国内在“外国出生的人必须是美国化的人”，必须说本土同胞的语言，必须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和美国理想，必须在言语和行动上坚定地宣誓效忠美国，并放弃对任何国外君主、当权者或政府的效忠。^⑥

① Isaac B. Berkson, *Theories of Americanization: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20, p.63.

② Woodrow Wilson, "Address at Convention Hall," Philadelphia, May 10, 1915,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611.

③ Louis D. Brandeis, "True Americanism,"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639-640.

④ Frances A. Kellor, "What is Americaniz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629, 631.

⑤ 伍斌：《西奥多·罗斯福的移民“美国化”观及其影响》，载《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春季号。

⑥ Theodore Roosevelt, "Americanism,"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645-646, 648-649, 654, 657-658.

总体而言，美国化旨在消除美国居民之间，尤其是移民与主流美国人在文化、政治、语言、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并通过坚持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价值观来促进美国的同一性。其目标是消除移民传统的文化认同和对母国的忠诚，接受并践行美国的公民社会理想，推崇美国的生活方式，认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并愿意为维护这一价值制度体系做出贡献甚至牺牲。

尽管美国社会意识到“美国化”外来移民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则并无清晰图景。相当长时间内，美国除了“共同语言和共同公民身份”的口号之外，移民的美国化问题并没有引起美国社会太多注意。诚如弗朗西斯·凯勒所言，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却没有任何国内政策，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来处理移民美国化这一重要问题。^①美国学者弗雷德·巴特勒也指出，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对移民实施美国化的重要性，然而“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制定美国化的计划，并提出完成这项伟大任务的确切方法”。^②西奥多·罗斯福在谈到移民美国化的具体实践时，也只是简单地指出，“每个公民都应该通过我们指挥的每一项活动认真地接受训练，以实现他对国家的责任”。^③至于由谁来提供移民美国化的训练，如何训练，罗斯福并未给出相应建议。

针对大规模外来移民，美国社会大体采取了从自然同化到强制同化的多重手段。19世纪90年代末，“熔炉”的概念象征着美国将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巨大能力。一般来说，多数人都赞同这样一种观念，即移民在与美国社会的不断接触过程中逐渐被同化。20世纪之初，以“赫尔之家”（Hull House）为代表的社会组织，通过协助移民寻找工作和教育等方式，推动移民在美国的自然同化进程，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移民抛弃其传统文化，“皈依主流的美国意识形态”。^④其他非政府组织包括工会、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革命之女等，也积极介入推动移民的美国化进程。

鉴于美国化内容包括语言及美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等，对移民进行美

① Frances A. Kellor, "What is Americaniz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628.

② Fred C. Butler, "Purposes of the Conference,"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702.

③ Theodore Roosevelt, "Americanism,"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652.

④ Robert A. Carlson, *The Quest for Conformity: Americanization Through Educ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75, pp.83, 79.

国化教育便成了一种普遍的方式。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青少年移民在学校学习美国的公民价值观和纪律，并将之传递给家庭成员。1893年，巴尔的摩的约瑟夫·安德烈斯牧师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天主教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表达了类似观点。安德烈斯认为意大利人需要被教育才能成为美国人。他在谈到意大利移民的孩子时指出，通过教育“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并获得了美国人的风度”。^①

移民归化入籍虽然不能等同于美国化，但是其重要内容。1906年，联邦官员开始担心州政府未能做好移民入籍的充分准备，认为美国化非常重要，不应由地方政府和其他机构单独负责，而需要由联邦政府协调和监督。政府规定精通英语是入籍的一项条件，于1906年成立移民归化局来监督和规范入籍过程，同时促进对欧洲移民的公民教育。^②1907年，参议院成立了迪林厄姆委员会（Dillingham Commission），对移民人口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为推进移民的美国化提供依据。1909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一道，为申请入籍的移民组织公民课程，并在全美主要城市召开有关移民美国化的会议，任命弗朗西斯·凯勒协调全国性美国化活动。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中，改革者、爱国团体、企业，以及市、州和联邦当局广泛合作，推动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并通过讲座、课堂和夜校的形式将其制度化。^③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一战”）的爆发，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动下，美国社会对移民族群飞地感到担忧，这些社区保留了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和语言特征，并与母国保持着广泛联系。他们深感关切的是，移民文盲无能力欣赏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实践，因而特别容易受外来政治意识形态和激进政治的影响。弗雷德·巴特勒强调，将移民彻底美国化应是国家的优先事项。^④路易斯·布兰代斯在1915年7月5日波士顿的演说中，将7月4日定

① Joseph L. Andreis, "Italian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in *Progres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America and the Great Columbian Catholic Congress of 1893*, Vol. II: *World's Columbian Catholic Congresses*, 6th ed., Chicago: J. S. Hyland and Company, 1897, pp.176-179.

② Desmond King, *Making Americans: Immigration, Ra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iverse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55-68.

③ Edward G. Hartman, *The Movement to Americanize the Immigra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164-187.

④ Fred C. Butler, "National Americanization Conference,"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702.

为“美国化日”。^①“一战”使“美国化”成为美国国内团结的中心议题之一，也使联邦政府积极参与移民“美国化运动”，旨在使移民“成为美国人”。

美国的公立教育制度体系主要是由州、县等地方政府负责。移民的美国化教育也沿袭了这一管理体系。加利福尼亚、密歇根和纽约等州意识到移民的美国化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问题，更是全国性问题。随着移民从一城迁移到另一城，从一州迁移到另一州，以州为单位的移民教育已经难以应对时需，联邦介入的必要性日益突出。联邦政府的兴趣越来越多地转向建立移民美国化教育的“基本原则、政策和标准”。^②公共教育和英语教学因此成为全美美国化计划的基础。理查德·坎贝尔指出，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说法，1915年入籍申请的100万移民中，有75%还不能成为合格的美国人，但他相信这些人可以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变为理想的公民”。面对“不符合美国公民标准”的众多移民，移民归化局与公立学校合作，以“提高公民标准”。公立学校得到联邦政府的援助，也积极“为改善和加强整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开展合作教育运动”，这是“伟大的美国化事业的第一阶段”。^③教育家们希望更加强调学校教育在培养移民性格、价值观、忠诚或纪律方面的作用。从1915年到1916年，美国引入了针对成年移民的美国化教育课程，由移民归化局统筹实施。这些课程旨在“向移民灌输美国的生活理想……并为他们成为公民做准备”。^④可见，美国社会对移民的美国化更多考虑的是移民儿童的教育，关注成年移民的美国化教育则是较晚的事情。

随着“一战”在欧洲愈演愈烈，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随之大增。政治领导人呼吁除了英语教学外，还要制定一项国家教育计划，以促进移民对美国公民理想和民主信仰的理解。西奥多·罗斯福尤其直言不讳地支持“百分

① Louis D. Brandeis, “True Americanism,”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639.

② H. H. Wheaton, “Education of Immigrants,”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569–570.

③ Richard K. Campbell, “Americaniz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675, 676, 680.

④ L.K. Carter, “Evening Schools and Chil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10,” Ph.D. dissertation, Vanderbilt University, 2009, pp.23–24.

之百美国主义”。^①这种极端的美国化直接指向德裔移民。罗斯福指出，任何带“连字符”的美国人都被认为是潜在的不忠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否则我们将滑入无限灾难的深渊。我们必须坚定捍卫自己的目标，坚决维护国内的正义。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分裂成交战的阵营，如果我们教育我们的公民不把彼此视为兄弟，而是视为敌人……那么我们肯定会失败”。^②

1916年，联邦政府进一步介入移民的美国化运动。移民归化局主导建立了一个由公立学校、俱乐部和民间组织构成的庞大移民教育网络，并负责编写和印刷相关教材。^③一些市、州和雇主在鼓励移民美国化的同时，也采取强制措施：一些雇主将工作晋升甚至工作本身与美国化挂钩，部分公司规定移民雇员必须参加公民课程，有些州甚至禁止在公共场合讲德语。^④这是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美国化，移民如不配合，就很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和政治权利，并被美国社会排斥。

美国化的教育，是一个通过教导和启蒙来赢得思想和心灵的过程。其本质是一种自然的同化过程，取决于美国化及其教育本身对移民的吸引力，并不需要强制和暴力。如果说积极的自然“美国化”过程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移民美国化进程的话，那么强制美国化在移民社区中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移民媒体和移民援助组织抨击了强制美国化对移民文化遗产的彻底摒弃。移民也通过拒绝长期参加美国化项目来进行抵抗。对于许多移民来说，美国化的过程是严酷的，往往意味着放弃一生的信仰。他们还目睹了移民父母与孩子之间因文化隔膜而导致的疏离。^⑤而且，到“一战”结束时，美国

①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94-222.

② Theodore Roosevelt, "Americanism,"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659.

③ Dorothee Schneider, "Naturalization and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in Two Periods of Mass Migration: 1894-1930, 1965-2000," p.60.

④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pp.247-250; Edward H. Bierstadt, *Aspects of Americanization*, Cincinnati: Stewart Kidd Company, 1922, pp.42-49, 95-100.

⑤ Rita Teresa Wallach,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Festival," *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 Vol. 16 (June, 1906), pp.315-319;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p.236; George Cary White, "Social Settlements and Immigrant Neighbors, 1886-1914," *Social Service Review*, Vol. 33 (March, 1959), pp.55-66.

化运动对移民入籍率的影响并不大。与大量移民相比，这一时期的移民入籍率仍相对较低。霍夫施塔特注意到移民“美国化”中的教育，及土生美国人和移民的态度，而未提及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的互动和博弈，也没有费笔墨阐述移民不同类型的“美国化”。面对在美国的移民，美国化进程并不顺利，美国社会更为担心仍在持续抵达美国的移民，立法限制潜在的移民也就变得愈发紧迫。

三、立法限制潜在移民

对于美国政府立法限制移民，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并未给予太多关注。他仅提到：“受平民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派们毫不讳言他们对移民的厌恶，并以一些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语言和观点痛斥毫不节制的移民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劳工领袖和学术界人士也和他们立场一致。”爱德华·A. 罗斯（Edward A. Ross）是进步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在1914年写了一本叫作《新世界中的旧世界》的书，站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进步主义立场阐释了反移民问题”。^①霍氏注意到当时美国社会对无节制的“自由移民”持普遍反对态度。事实上，“改革年代”美国的移民立法及其争论复杂且丰富。

美国历史上曾一度奉行自由移民的政策，甚至鼓励外来移民。1863年，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在众议院发表讲话，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移民进入美国，并成立特别委员会具体实施。次年4月，该委员会提出一项鼓励移民的法案。在建议通过该法案时，该委员会指出，由于战争导致约125万人离开其平时的工作岗位去保护联邦和政府，进而导致大量岗位空缺，这严重影响了地方和联邦经济的发展，美国正面临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其结论是，这种“对劳动力的需求只能由移民来填补”。^②该法案于1864年7月4日成为法律，规定在纽约市设立一个移民办公室，负责将抵美的移民安

①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5页。

②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Immigration Legisl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331-332.

全地运送到目的地。这部于1868年被废除的法律，是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唯一一部鼓励移民的法律。

在整个19世纪，欧洲人移民美国几乎没有遭到实质性的阻遏。美国开始立法限制移民则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1875年，最高法院明确有关移民的立法权归属联邦。此后，美国联邦政府积极进入移民管理领域，并在19世纪90年代将埃利斯岛作为美国东部的主要移民接收站。^①虽然1882年美国颁布的《排华法》禁止了华人劳工移民，但直到19世纪末美国对欧洲移民仍是开放的。

到19世纪90年代，遏制欧洲移民的想法逐渐在美国产生一定影响。1891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将患有“危险传染病”的人，及一夫多妻者列入被排斥之列。^②根据该法，移民官员在各港口对入境移民进行系统的卫生检查，轮船公司负责遣返被排除在外的外国人，并承担遣返的相关费用。这就迫使运输移民的轮船公司采取谨慎的态度选择登船的移民，尽量减少乘客被遣返的可能性。^③1897年沙眼被列为“危险传染病”，沙眼患者被禁止移民美国。^④

西奥多·罗斯福虽赞成一定程度上限制移民，但他入住白宫后对移民的表态变得更为谨慎。1901年底，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呼吁国会制定新的法律。他指出，“目前的移民法不能令人满意，我们需要诚实、高效、适合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需要来美国定居的移民，需要有强壮的身体、坚强的内心、聪明的头脑和坚定的目标，在各个方面做好自己的职责”的移民。罗斯福希望将“无政府主义者”“道德低下者”和“廉价劳动力”排斥在美国的移民之外，如此方能阻止美国城市弊病的蔓延。^⑤为因应罗斯福的呼吁和日益高涨的仇外情绪，国会于1903年禁止“白痴、精神病患者、癫痫病人和五年内精神失常的人……职业乞丐”进入美国，同时对运输上述移民进入美国

① David M. Reimers, *Unwelcome Strangers: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e Turn Against Immigr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

② Jeremiah N. Jenks and W. Jett Lauck, "Social Problems of Recent Im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278.

③ Costanza Biavaschi and Giovanni Facchini, "Immigrant Franchise and Immigr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Progressive Era,"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Apr., 2020), p.10.

④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Causes of E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81-82.

⑤ Theodore Roosevelt,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 15,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5, pp.161-162.

的轮船公司处以每人100美元的罚款。^①这些限制并没有给移民进入美国带来实质性影响，欧洲移民仍在加速进入美国。

读写能力测试与文化检测当时被很多美国人视为限制不符合美国精神的移民的有效手段。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于1891年在众议院任职时，首次向国会提出一项针对移民读写能力的法案，并就此与西奥多·罗斯福反复讨论。新成立的移民限制联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也积极游说对移民展开文化测验。^②洛奇的呼吁得到了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即便是一向反对限制移民的简·亚当斯也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达到同化能力的极限，我们接受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有可能模糊我们乐于称之为美国人的那些特征，其必然结果是，国家的生活水平有可能降低”，因此，对移民进行适当的限制是合理的。^③

针对移民文化测验的法案于1897年在国会经过充分讨论。1月27日众议院以135票对123票、97票弃权的微弱优势通过了该法案。其关于文盲的定义为，所有心智健全、超过16岁且没有读写能力的人，合格移民的年迈父母除外。参议院对该法案进行微调后，也予以通过。克利夫兰总统于1897年3月2日否决了该法案。他认为欢迎移民是美国的国策和传统，过去百余年美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巨大成功。在谈及当时美国移民的“质量堪忧”时，克利夫兰指出：“类似的事情在以往的移民中也有发生，他们及其后裔都将成为美国最好的公民之一。”他认为当时美国劳动力过剩和劳工市场竞争激烈是经济萧条所致，与移民并无直接关联。^④

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后，关于移民文化检测的讨论重新进入国会。众议院于1902年5月对文化检测法案展开讨论，后经参众两院的几轮争辩，文

① Marion Bennett,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ies: A History*,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3, p.23;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Causes of Emigr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81–82.

② Barbara Miller Solomon, *Ancestors and Immigrants: A Changing New England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pp.118–119, 124.

③ Jane Addams, “Immigration: A Field Neglected by the Scholar,”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3.

④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Immigration Legislation,” in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pp.343–344.

化测试条款被删除。1903年3月3日由总统签署的移民法，虽然赋予政府将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拒之门外的权力，但取消了移民读写能力或教育水平的测试。随着移民人数的持续增长，罗斯福一再呼吁众议院就此问题采取行动。美国第五十九届国会提出新的法案，以修改和强化1903年移民法限制移民的条款，但引入读写能力测试条款的尝试仍以失败告终。^①在1906年和1907年，美国社会要求对移民进行读写能力测试的呼声再起。移民限制联盟和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也对此表示支持。但是针对移民的读写能力测试仍有颇多反对者。罗斯福在任总统期间没有公开支持对移民进行读写能力测试的提议，但他要求对移民进行“细致而非敷衍的教育测试”，以减少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无知之人进入美国。^②在他任期内，文化检测并未成为法律条款。

由于美国社会对移民问题日益关注，国会于1906年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移民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该委员会在1907年4月22日选举出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廉·迪林厄姆为主席后正式成立，人们也惯以“迪林厄姆委员会”称之。其成员包括三名参议员、三名众议员和三名专家。这些从国会中选出的成员多有明显的限制移民的倾向，其中八人为公开的限制移民者，只有一人对移民的态度相对温和。^③迪林厄姆委员会在密集工作四年后，发布了一份41卷的调查分析报告，即《移民委员会报告》（*Immigration Commission Report*）。该报告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对移民开展的最全面的调查研究。《移民委员会报告》明确表达了在美国出生的人对移民被同化的担忧，强调当时移民和早期移民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并呼吁大幅减少移民数量。其结论是，南欧和东欧人不如北欧和西欧人，因此应该受到限制，并建议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对亚洲人的禁令也应维持。^④根据报告的

① Costanza Biavaschi and Giovanni Facchini, “Immigrant Franchise and Immigr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Progressive Era,” pp.10–11.

② Theodore Roosevelt,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Vol. 15, pp.161–162.

③ James S. Pula, “The Progressives, the Immigrant, and the Workplace: Defining Public Perceptions, 1900–1914,” *Polish American Studies*, Vol. 52, No. 2 (Autumn 1995), p.65.

④ U.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Immigration Commission Report*, Vol. 23,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1, pp.58, 168–170; Jeremiah W. Jenks and W. Jett Lauck,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A Stud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Conditions and Needs*, pp.410–411.

结果，迪林厄姆于1911年提出了一项包括移民读写能力测试的法案。该法案于1913年1月25日由众议院通过，塔夫脱总统在2月14日否决了该法案。随后国会试图推翻总统的否决，但未成功。1915年1月15日，美国国会再次通过含有移民文化测验条款的移民法案，但同样被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否决。这是美国总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成功否决有关移民读写能力测试的法案。^①

多位美国总统否决含有文化检测条款的移民立法，乃在于其在当时的美国颇具争议，但其作为一种限制移民的手段，与当时美国总体限制移民的大势是一致的。其成为美国法律也只是时间问题。随后众议院的一项移民法案，重新引入文化检测条款，并于1916年3月30日以很大的优势通过。参议院也通过了一个类似版本。威尔逊总统再次否决了法案。但这一次，他的否决被参众两院轻松推翻，使该法案在1917年2月5日成为法律。^②这时，在美国国会首次提出文化检测条款二十年后，该条款终成法律。此后，新来的移民必须通过相应的文化水平测验方能进入美国。

然而，无论是先前诸多限制移民的立法，还是新通过的文化测验法，并不能有效阻止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大规模移民。“一战”结束后，移民潮迅速再起，促使国会寻找限制移民的新方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会众议员约翰逊·里德（Johnson Reed）提出暂停移民十四个月。1920年12月13日，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这项倡议，但被威尔逊总统否决。到1921年，国会准备通过一项限制移民的法案，对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设置较低的配额。该法案规定，以1910年人口普查为依据，将移民限制在非美国出生族群人数的3%。^③该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于1921年5月19日由沃伦·哈定总统签署颁布执行。该法的有效期至1924年6月30日。随着该法最后期限的临近，美国需要新的立法来限制移民入境。约翰逊·里德再次提出新的法案，进一步将移民来源配额减少至1890年人口基数的2%。^④该法案在美国参众两

① Costanza Biavaschi and Giovanni Facchini, “Immigrant Franchise and Immigr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Progressive Era,” p.11.

② David M. Reimers, *Unwelcome Strangers: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e Turn Against Immigration*, p.18.

③ David M. Kennedy,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66.

④ Costanza Biavaschi and Giovanni Facchini, “Immigrant Franchise and Immigration Policy: Evidence from the Progressive Era,” pp.11-12.

院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并在1924年5月26日由总统签署颁布。如果说1921年的移民法对限制东南欧移民还留有余地的话，那么，1924的移民法则试图从根本上禁止这些移民进入美国。

美国社会也不乏对限制移民的踌躇，甚至反对之声。迪林厄姆委员会的移民调查报告促使一些学者为新移民辩护。犹太裔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克·霍维奇驳斥了迪林厄姆委员会关于移民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的结论，并在1912年出版的《移民与劳工》一书中抨击了委员会关于限制移民若干理由的分析，认为“新移民”与“旧移民”的区别主要在于数量而非质量，新移民没有损害美国的经济，迪林厄姆委员会的结论是基于偏见而非确凿的事实。^①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瑟夫·坎农（Joseph Cannon）也一直反对限制移民。^②

美国进步人士和组织还成立专门机构，以阻止美国政府通过限制移民的立法。“赫尔之家”于1908年在芝加哥组织了移民保护联盟（Immigrant Protective League）。该组织在格蕾丝·阿伯特（Grace Abbott）的领导下，更关心移民本身，而不是同化和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之争。阿伯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组织者，且颇具幽默感，常在国会作证，甚至前往欧洲，通过参观移民的祖国，更好地了解移民问题。此外，她还设法缓解移民在美国的社会和工业适应问题，认为这是更重要的移民问题。她敦促地方和国家政府接管像移民保护联盟这样的组织，以便更好地解决移民问题。^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进步派对移民的理解。《改革年代》中亦提及：“当你阅读进步派讨论移民问题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献时，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从前‘中立派’们的本土主义偏见，正被一种心灵和意志的积极努力克服；你会看到那些思想正派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派，一直在以他们自己的人道主义价值做自我提醒，提醒自己要看到移民的勇气，移民艰难生活的现实，他们背井

① Isaac Hourwich, *Immigration and Labor: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Europe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utnam, 1912, p.499.

② Robert F. Zeidel, *Immigrants, Progressives, and Exclusion Politics: The Dillingham Commission, 1900-1927*,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7; Katherine Benton-Cohen, *Inventing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The Dillingham Commission and Its Leg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50.

③ Edith Abbott, “Grace Abbott and Hull House,” *Social Service Review*, Vol.24 (Dec., 1950), pp.493-518; Edith Abbott, “Grace Abbott: A Sister’s Memories,” *Social Service Review*, Vol. 13 (Sept., 1939), pp.351-407.

离乡的辛酸，他们祖国的文化成就，他们最终成为一名美国人的潜力，以及一个最重要的事实：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中最艰难、最肮脏的那些劳动，正是这些移民在承担。”^①这些进步派和受其影响的“中立派”对移民美国化往往持更为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对限制移民也缺乏积极性。

总体来说，美国限制移民和接纳移民的历史一样悠久。20世纪初美国对移民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对移民进行限制，其中的关键考量就是担心那些未实现“美国化”的移民参与美国政治，进而伤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共和体制。这是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也有触及的内容。然而美国限制移民政策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美国的不同群体对外来移民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在整个“改革年代”，外国出生的美国人都支持美国保持自由移民政策；在拥有大量入籍公民选区的候选人，更倾向于开放移民，渴望廉价和充足劳动力的商人，也希望实施持续开放的移民政策。而鲜受移民选票影响的国会议员，更可能支持限制移民。^②行政与司法在限制移民过程中的权力争夺，也是重要但《改革年代》并未涉及的内容。

长期以来，许多土生美国人一直相信移民能够融入美国生活，实现美国化，成为美国人。然而，美国社会对移民同化的信心在20世纪初大规模的东南欧移民潮中崩塌。土生美国人竭力限制这些移民，包括进步人士在内的美国人，对聚居于美国城市飞地的移民也不满，主张限制移民。那些受教于精英大学的人，似乎更有可能支持限制性移民政策。而一些倡导“优生学”的美国人，则主张严格选择移民，确保“错误的人”不会在美国降生。^③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有英国、爱尔兰和德国血统，担心新移民会破坏罢工，接受低工资。^④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美国限制移民的立法也愈发严苛。美国对欧洲自由开放移民的时代至此终结。霍夫施塔特并未明确“改革年代”移民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征。

①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8页。

②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p.104.

③ Michael McGerr, *A Fierce Discont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1870-19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10-211.

④ Jacob Riis, *The Battle with the Slu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2, pp.203-204.

结 语

本文从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有关移民的论述中,引出“改革年代”移民的总体经历,进而分析霍氏的洞见与未论及之处。不难看出,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一笔带过的移民问题,已涉及移民与政治、移民美国化、限制移民三个核心问题,它们也是当时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然而,移民不但与美国政治和社会紧密相关,也深度影响到后续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此而言,霍氏在《改革年代》一书中严重忽视了移民的角色。霍氏对移民着墨不多的论述中,也多引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自己的观点阐发甚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并非不可理解:第一,该书的主题侧重于政治文化,而非移民;第二,他非研究移民史的专家,对移民问题的忽视亦在情理之中,不宜苛求;第三,当时美国移民史学初创,移民史的影响力有限,学术的惯性使得人们对移民史尚未特别关注,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也没有得到有效挖掘。

“改革年代”移民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直接且剧烈的。当时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本就给美国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变化。事实上,霍夫施塔特所说的“改革年代”基本上与美国的进步时代重叠,在这一时期,诸多思想和行动指向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的不良影响。^①对于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来说,他们长期面对美国政府官方的调查与限制,相关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如果说“追求社会正义”是进步时代美国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移民的经历显然偏离了这一主题。

无论是美国化还是立法限制移民,其本质都是一种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前者试图尽最大可能抹去已经在美国的移民所携带的外来因素,后者则竭力阻止潜在的移民。尽管这一时期美国的外来移民以东欧和南欧人为主,移民的总体经历也多有相似之处,但在其内部不同移民族群间仍然存在差异。值

^① Frederick R. Lynch, "Social Theory and the Progressive Er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4, No. 2 (Summer 1977), p.159.

得一提的是，在“改革年代”的美国，也有相当数量的亚洲移民进入美国。他们在美国政治上几乎处于完全失语的地位，也面临美国社会施加的各种歧视与排斥，甚至暴力。他们与美国欧洲移民的境遇大不相同，面对的不是同化或限制，而是禁绝与驱逐。本文所提及的外来移民对美国政治的参与，以及美国社会推动移民的美国化和限额，针对的是欧洲移民，亚洲移民的不同经历则需要另外的故事来进行讲述。

后世历史学家鲜有认为美国“改革年代”的改革是革命性的。进步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一场中产阶级的运动，是在美国既定的政治实践和模式框架内发生的。霍夫施塔特认为移民“有效地限制了进步主义的规模和成果。地方改革的成效之所以如此短命，移民选择对大佬的忠诚是一大原因”。^①这种论述无疑夸大了移民的能动性和影响力，忽视了进步主义改革的实质。从美国总体政治和社会层面而言，“改革年代”在美国历史上是否具有转折性意义，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如果单从移民的角度看，霍夫施塔特所说的“改革年代”无疑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从1903年至1924年，美国联邦政府在限制移民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其间美国所颁布的一系列移民法不但终结了美国对欧洲自由开放移民的历史，也进一步明确了“谁是美国人”和“谁可以成为美国人”的问题，从而构成了美国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的关键节点。

（伍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

①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第209页。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 The Producer Tradition and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dustrial Era

Cai Meng

Abstract: Hofstadter criticized the irrational mind of American farmers when confronted with industrialization, summarizing it as “agrarian myth”. In fact, this irrational mind is not unique to farmers but a kind of “producer tradition” derived from the preindustrial era. It is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social experience of the preindustrial era, emphasizing the mor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value of labor, as well as the moral priority of “producers” over “non-producers”. When encountering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oducer tradition” often externalizes as a highly moralized and universal political discourse. It cannot be narrowed down to “class discourse” and cannot simply be incorporated into modern social movements. Only by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producer tradition” can we accurate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dustrial era.

4. American Immigrants in “the Age of Reform”

Wu Bin

Abstract: *The Age of Reform*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the renowned American historian Richard Hofstadter. It was a general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many of the issues it covered had become classic topics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inspiring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historical scholars to reinterpret them. During this perio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received an influx of immigrants on a scale which was never seen in human history. These immigrants had profound impacts on American society. Limited by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scholarly context, not much was written in *The Age of Reform* about the interaction of immigrants with American politics and culture. However, Hofstadter touched three key issues central to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ization, and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Hofstadter’s minimalist account neither adequately reflected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merican society, nor provided an in-depth glimpse of the influence that American society exerted on immigrants. In fact, immigrants had bee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American “The Age of Reform,” which was a critical period in terms of both nation-building and state-building.

5. Richard Hofstadter and His *The Age of Reform*

Wang Yu

Abstract: Richard Hofstadter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historian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is considered his *magnum opus*.